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Engagement:
A Cultural Study on Late Qing Fiction
Translations

文学翻译与文化参与

——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化研究

胡翠娥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I207.4/13

2007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翻译与文化参与

——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化研究

胡翠娥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翻译与文化参与: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化研究/胡翠娥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ISBN 978-7-5446-0424-6

I. 文… II. 胡… III. 小说—翻译—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8209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a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ap.com.cn> <http://www.sflap.com>

责任编辑: 周岐灵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65千字
版 次: 2007年5月第1版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 100 册

书 号: ISBN978-7-5446-0424-6 / H · 0178

定 价: 17.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总序

翻译研究是不是一个学科,翻译有没有“学”,现在不应该再费时论争了。董秋斯 1951 年就提出要建立翻译学,要写出两部大书,一部是《中国翻译史》,另一部是《中国翻译学》。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列·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在为《翻译研究丛书》写的总序中第一句就宣称:“The growt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separate discipline is a success story of the 1980s.”(1993)我国 1979 年就开始招收翻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6 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了首批“翻译理论与实践”(二级学科)的硕士点,现在已有一大批以翻译研究为学术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1989 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都陆续设立了一些翻译研究项目,1992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学科分类与代码》,把翻译学正式定为语言学(一级学科)中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虽然这个学科定位还不够科学,但这个学科的存在已被公认。这说明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和发展的。

近 20 年来,这个领域的中国和外国学者都在努力加大研究力度,拓展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次,陆续出版了不少翻译学研究的新成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满足国内翻

译教学的需求和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经过精心选择,引进了一套“国外翻译研究丛书”(现已出版 29 种),这在我国翻译界还是第一次。这套丛书在翻译教学和研究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它的重要参考和借鉴作用。

但是引进与借鉴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结合我们自己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实践进行新的创造。怎样创造?许多学科的发展史证明,要创造就要中外结合。怎么结合?中国学术史告诉我们,要结合就要以自己的研究为根基,以国外的研究为参照,借鉴其理论与方法,改造和创立基本范畴,建立新的范畴系统。这个以自己为主的中外结合的原则就是学科建设的方针,也是我国翻译研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引进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结合我们的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与研究,写出与我们自己的实际密切结合的论著。国内已经出版了一些这样的著作,对翻译学的建设起到了某种程度的推进作用,功不可没。但从理论的系统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来说,我们还没有一本多数人认可的《翻译学导论》。此外,在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性研究、外国译论的借鉴性研究、翻译实践(包括翻译教学实践)中新问题的探索性研究、相关学科(如文化、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社会学、哲学等)的吸融性研究以及方法论的多层次研究(包括本学科的和相关学科的)等几个重要领域,也都缺乏高水平的系统研究的论著。

为了进一步推动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满足这个学科研究生教育的教学与研究的需求,我们特别组织国内专家撰写以翻译学学科本体研究为主的系统的理论性论著——“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在筹划这套丛书时,我们了解到中山大学“985”学科建设项目中也正组织编写“中山大学翻译研究丛书”;我们很高兴把他们的这些选题纳入到“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中来。本丛书是一个开放性的系列,我们撰写、约稿的原则是:(1)作为翻译研究类的学术专著,应充分反映本领域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2)追求理论的系统性和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目的是对翻译学的发展和翻译人才的培养能起重要的推动作用;(3)用汉语撰写。读者为高等学校翻译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师、研究生,翻译学界、语言学界以及文学、哲学与心理学等学界的翻译工作者和爱好者。

翻译是人类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之一。I·A·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曾说,翻译很可能是宇宙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最复杂的一类活动。它的复杂性必然对我们的研究构成挑战,要求我们的研究不断拓展,不断创新,不断深化。从古至今,大体说来,人类对翻译的研究已有了直观经验式的、文艺学的、语言学的、文化学的等多种视角和方法。我们相信,我国的学者一定会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一道,对人类这项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断加以探索,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编委会



序

读了胡翠娥博士的专著《文学翻译与文化参与——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化研究》，我感到惊异与欣喜。在我的印象中，国内不少从事外语研究的年轻人往往知外而不知中，知今而不知古，对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尤其缺少知识，因此谈起国外的理论来头头是道，一联系起中国的实际来却往往肤浅可笑。这本书完全改变了我的看法，其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熟悉、对晚清社会与社会心理的剖析、对中国小说与评点传统之评价，即使放在中文系或历史系的学者中恐怕也不见逊色，而其对国外理论的掌握与外文本身的优势又或过之。这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国际地位的提高，更多的外语研究者开始关注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在一批博古通今、中外兼修的前辈学者带领下，一代新的外语学者、翻译研究者正在成长起来。胡翠娥就是其中一个突出代表。

由于对晚清小说翻译这个题目本身就有浓厚兴趣，因此我读这部书稿时特别仔细。我的总体感觉是，这是一部富有创新精神的专著，其中有五个方面尤其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

第一，这部书为翻译的文化论提供了一个实例。国内翻译界介绍、引进“翻译的文化转向”学说已有时日，但多数只是蜻蜓点水似地举几个例子。如何运用这个理论对一个典型时代的翻译活动作全面而深入、从宏观到微观的细致探讨？如何把翻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语言现象去研究？在这些方面还鲜见深刻而成熟之作。从这个意义

上说,本书确实是填补了一个空白,弥补了一个缺憾。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运用这个理论去重新认识、梳理中国的翻译文化史,是有很大借鉴意义的。

第二,本书打破了迄今为止多数翻译批评所采取的以文本对照为主体、以理想译本为指归的单一模式。翻译的文化论既是翻译研究的本体论,又是翻译研究的方法论。本体论的确立必然带来方法论的巨大变革,其对翻译批评的影响尤大。有的人理论上接受了翻译的文化论,但在具体进行翻译批评时却还是纠缠于一字一句的得失,头脑里一把“忠实度”的尺子总是挥之不去。像本书所作的彻底撇开“忠实性”,专从社会与文化、译者与受者心理角度对翻译的功能和价值进行研究的尝试,确实为数不多。从这方面说本书为翻译树立了一个文化批评的样板,也未尝不可。

第三,从文化批评出发,作者注意到了一些长期为翻译界、文学界所忽视乃至轻视的“两不管”地带,对所谓的“伪译”与“伪著”现象进行了深入而恰如其分的分析,肯定了其社会学与文化学意义。这一论述不仅具有翻译史的意义,而且具有文学史的价值;不仅丰富了翻译史的内容,而且丰富了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内容。作者通过研究,肯定了当时一些貌似“不忠实”的翻译,其实其译者对于翻译的态度远比今日某些号称“忠实”的译者来得认真。这一“翻案”具有重要的文化学意义。

第四,作者经过研究,认为晚清与“五四”时期的翻译不应合为一体,这一观点也很有见地。事实上,这两个时期在文化背景、特别是翻译的指导思想上确实都有很大的不同,即使从翻译思想发展的角度看,也应该把两者分开来研究。就我所见到的一些论著来看,本书应是较早提出这一点的。

第五,作者立论的基础是西方文化学派翻译学家 Lefevere、Even-Zohar 等人的理论,却没有全盘照搬,而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了修正和补充,作者突破了“在弱势文化系统和翻译系统的一级地位及创新形式之间、在强势文化系统和翻译系统的二级地位及形式沿袭之间建立必然的联系”的观点,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多元系统的翻译学说。表明中国的翻译研究者在日新月异的国际翻译理论前面不是简单的受众。这是很值得肯定的。

从上述五个方面可以看出,本书在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中具有一

定的领先性和开拓性,堪称新时期翻译研究的重要成果。我们为作者所取得的成绩表示高兴。

作为一位年轻作者,本文有些不足之处也是难免的。我想着重提出的是,尽管作者对“雅”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但就总体而言,她对严复“信达雅”的理解仍然未能突破前人的框框。其实,从作者的整体分析上,我们已能感受得到,在当时缺少文本对照方法的背景下,严复是不可能提出以原文、特别是以原文忠实度为指归的“信达雅”翻译标准的。近百年来对“信达雅”的阐释恐怕从一开始就背离了严复的原意,也脱离了严复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信达雅”的重新解释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清末从严复的社会政治翻译到林纾等的小说翻译。作者距此真正只有一步之遥,却未能突破,这是很令人惋惜的。我想,结合借鉴西方新的翻译理论,重新思考中国自严复以来一些似乎早已有“定评”的翻译理论和翻译观点,也许是重新认识中国翻译学说史、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的突破口。愿作者能以此书的出版为契机,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潘文国

2006年12月23日于上海

目 录

绪 论	1
一、对晚清小说翻译进行文化研究的意义	1
二、晚清小说翻译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述略	5
三、研究方法、任务和内容简介	10
第一章 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准备	23
第一节 小说界革命	24
第二节 译以致用	27
第二章 翻译的基础：世界公理、普遍人性和普遍文心	31
第一节 世界公理	34
一、“天下”·“瀛环”·“世界”	34
二、西方·西学·世界公理	37
三、新的小说价值体系	41
第二节 普遍人性	43
一、华夷之辨和人禽之辨	43
二、世界公性情	46
第三节 普遍文心	53
一、古文义法	54

二、林纾的普遍文心	55
第三章 翻译策略和翻译准则	61
第一节 翻译途径	69
一、译自西洋的直接翻译	69
二、经由日本的转译	72
第二节 翻译方法	77
一、“信达雅”的提出和失落	77
二、译意不译词的翻译方法	90
三、“直译之弊”和忠实的翻译	100
第三节 翻译的文本操控	114
一、沿袭古典小说程式的翻译诗学范式	115
二、语言文体	116
三、文学形象的中国化	128
四、文化参与:翻译兼批评	143
第四节 翻译形式	163
一、主体形式	164
二、完成形式	172
第四章 翻译评论	203
第一节 艺术审美	204
一、译笔雅驯	204
二、情节离奇和非奇不传	211
第二节 道德评判	216
一、纲常名教	217
二、有益世道人心:对神怪小说的批判	223
第五章 晚清翻译小说与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	227
第一节 晚清翻译小说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	227
一、现代小说的萌芽	228
二、对五四作家文学倾向和文学道路选择的影响	241
第二节 晚清翻译小说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247
一、晚清反传统思想和现代精神的萌芽	247

二、晚清翻译小说和现代性	251
余 论	261
参考书目	265
后 记	273

绪 论

一、对晚清小说翻译进行文化研究的意义

(一) 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晚清小说翻译

翻译界对晚清小说翻译从数量到质量的认识都是很不完全的,有的将它从翻译史中一笔抹杀,有的把它作为一个附件并入其他时期的翻译活动中。前者最迟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还存在,如湖北教育出版社的“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就认为,“打开中国的翻译史册,仅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有过三大翻译高潮,即从东汉到宋代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和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①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的余绪,除增加了政治、经济、律法等书种外,其根本宗旨、目的和翻译方法并无二致。后者如罗新璋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把汉末以来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汉唐以来的佛经翻译理论;二是近代和五四时期的翻译理论;三是解放以来“神似”和“化境”论。其中他说到,近代和五四时期与前一阶段的不同之处在于出现了以严复的“信达雅”为标志的中心理论,翻译界的论战也往往起源于对“信达雅”的

^① 转引自许钧:《切实加强译学研究和翻译学科建设》,《中国翻译》(中) 1991 年第 1 期。

不同理解。^①罗把近代和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合为一体,即把晚清的小说翻译附属于五四时期的翻译,这不利于对二者作独立的研究,尤其不利于对前者的研究。近代的翻译活动(主要是清末民初)和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存在迥然不同的地方。近代的翻译活动是继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之后的第三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其翻译重点是小说翻译,其总体特点是“达旨”似的自由译述;而五四时期的翻译在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戏剧和诗歌各方面齐头并进,直译成为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特征。因此,晚清的小说翻译完全有资格而且应当被作为一个独立的现象作系统的研究。首先,晚清的小说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在鸦片战争后至五四前的翻译高潮中,“以文学翻译,尤其是小说翻译最为繁荣,影响也最大。”^②因此,晚清的小说翻译成为中西文学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这是任何比较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思想史都不能忽视的研究领域,它同样也是翻译研究者理应研究的对象。第二,虽然严复的《天演论》在中国思想界打响了轰天炮,引进西方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等现代思想,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但是就翻译而言,仅以他的“信达雅”翻译原则来囊括整个晚清生机勃勃的小说翻译活动,则有失偏颇。毕竟严译名著只有8种^③,而小说翻译却在千种以上。据《涵芬

- ① 罗新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4页。
- ② 王继权:《略论近代的翻译小说》,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3—55页。
- ③ 即《天演论》,1898年始刻于湖北沔阳慎始基斋,后商务印书馆于1905年出版;《原富》,南洋公学译书院1901—1902年出版;《群学肄言》,1903年文明编译书局出版;《群己权界论》,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三年前译成,名为《自由论》;《社会通论》,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法意》,1904—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名学浅说》,商务印书馆1909年出版;《穆勒名学》,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另,根据王栻,《天演论》最早于1895年有陕西味经售书处刊本,所以梁启超能在1896年《论译书》中称赞严复所译《天演论》的方法。王栻说严复翻译了11部,在前8种的基础上还有《支那教案论》,《中国教育议》和《欧战缘起》,前8部被编入《严译名著丛刊》。(王栻:《严复与严译名著》,收录于《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贺麟说有9种,在前8种之外还有《中国教育议》,原文名不详,1914年由文明书局出版,仅译得46页。(贺麟:《严复的翻译》,收录于《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

楼新书分类目录》(所收书目最迟到 1911 年)统计,文学类共收翻译小说近 400 种,创作小说约 120 种;据阿英《晚清小说目》估计,1840—1911 年间的创作小说有 420 种,翻译小说 587 种,其中翻译的数量超过半数;40 年后樽本照雄根据 1988 年出版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得出,1840—1911 年间创作小说 1288 种,翻译小说 1016 种,翻译占 44%。^①无论是相对比例还是绝对数量,这么丰富而巨大的翻译数据,理应引起翻译研究者的兴趣和热情。更有甚者,晚清的小说翻译一度被排除在“翻译”的正殿之外,如林纾的翻译很长时间以来被有的翻译研究者认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斥之以“不足为训”^②。第三,晚清的小说翻译所呈现出的工具主义和浓厚的政治色彩是前所未有的,它是在 19 世纪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大环境下,在西方冲击(直接原因是中日甲午战争)和国内富国强兵的双重压力下,由资产阶级改革派发起的一次回应和努力。这次翻译活动所涉及人数之多、势力之大、流行之广都是史无前例的。它不同于以往只借鉴学习西方的“器”、“技”而仍不失帝国尊严和文化优势的科技翻译,相反,它是士大夫文人对中国文化各层面进行思考和改良的一种努力。研究这一阶段的翻译活动,将有助于理解翻译活动和晚清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晚清的小说翻译研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有其本身的原因,也同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 and 视野有很大的关系。首先,就其本身而言,晚清的小说翻译存在几个特点,因而极大地减弱了对研究者的吸引力。一是很多译著不标明原著和原著者,也不标明是译还是著,译者也往往隐匿真实姓名。这为传统的以文本对照为主的翻译研究者带来了巨大的阻碍,使他们无法作细致的分析,因为文本对照几乎是传统翻译研究的全部。二是由于当时压倒一切的政治热情及小说界革命的号召,晚清

① 樽本照雄:《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经日本传到中国的翻译小说》,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1—169页。

② 如朱光潜把林纾的意译同较早的佛典翻译如《四十二章经》之类和英美人译中国诗时强合音律的做法斥为“都不足为训”。(朱光潜:《谈翻译》,《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

小说译者没有时间像五四学者那样对直译、意译^①、翻译的哲学原理、意义和价值^②、风格的可译性^③等范畴进行系统的论述和思考,而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译介小说有益世道人心。这种被强调到极致的政治热情使他们的兴趣和关注都投在了翻译的教化功能和政治功能上,而掩盖、模糊了对翻译本体论的注意,更无暇思考上述吸引五四译者和学者的问题。他们的这种观念和对翻译的零星见解充分体现在其译序、跋尾中。第二,一个领域是否得到深入的研究除了其本身的材料外,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研究者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每一个时代的翻译研究都免不了受该时代一些主导问题和预设概念的限制,并且往往从收集材料开始就已经带上了先人为主的假设,探讨的也是预先设定的问题。同时,过去的研究传统又为后来者设制了一定之规,局限了他们的视角。倘若译界认定“意译”、“自由译”是非正统意义上的翻译,不值得研究,那么对以“意译”、“自由译”为主的晚清小说翻译,自然缺乏兴趣,更遑论客观、科学的研究了。

(二) 研究意义

从总体上说,对晚清小说翻译作为独立的文化研究具有以下几方面意义:

1. 从宏观上认识晚清的小说翻译活动在整个晚清文化大系统中的

- ① 如艾伟《译学问题商榷》,瞿秋白《关于翻译——给鲁迅的信》,鲁迅《关于翻译——给瞿秋白的回信》,林语堂《论翻译》,艾思奇《翻译谈》,木曾《翻译释义》,朱光潜《谈翻译》等。(分见《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第160—180,215—222,223—228,259—272,317—321,322—336,353—363页)
- ② 贺麟:《论翻译》,《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
- ③ 如郑振铎《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沈雁冰《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二人都认为风格不是捉摸不透的精神,而是体现在单字、句调中的有形的组成,是可以移植的。杨镇华在《翻译研究》中则以“雅”代替“风格的转移”,认为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的,风格不是从作品本身单独分开来的东西,只要忠实(信)于原作,则原文的风格自然会有,因而没有必要提“雅”。常乃慰在《译文的风格》中则否认风格的可译性,译文表现的风格只是译者自身的风格。(分见《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第64—92,93—98,287—316,366—371页)

地位和功能,理解小说翻译和晚清文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2. 晚清社会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在这一过渡阶段,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和以西方和西学为参照的世界主义在最后十年统一在晚清富国强兵的渴望之下。晚清文人译者在输入世界知识的同时,如何有效地维护、发展固有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在废除科举这一入仕道路之后,他们又如何通过文学翻译活动继续中国文人政治参与和文化干预的角色?本书的研究将帮助透视晚清文人翻译群体在中西文化之间的协商和自我定位过程。

3. 最后,对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化研究有助于我们真正认识“翻译”作为文化交流和文化协商的本质意义。

二、晚清小说翻译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述略

(一) 1949年以前的研究

尽管晚清的小说翻译非常繁荣,但是建国前对如此丰富的翻译小说及其译者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即使有,也多以论文或章节的形式附于文学史或小说史的专著中。主要包括郑振铎的《林琴南先生》(《小说月报》,1924年11月10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年)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年)、阿英的《晚清小说史》(1935年)、吴文祺的《林纾翻译小说应该给予怎样的估价》(《文学百题》,1935年)以及杨世骥的《文苑谈往》(1946年)等。下面作一简要介绍。

郑振铎的《林琴南先生》是专门对林纾的文学翻译活动而作的回顾和评价,文中对林纾翻译的小说数量有比较详细的统计和介绍。他认为在156种林译中可以称得上完美的只有40余种。对林纾在翻译方面的贡献,他从三个方面予以了充分的肯定:(1)提高了人们关于世界的常识性知识;(2)增强了我国人民对西方文学的了解;(3)打破了我国看不起小说的传统,因为林纾放下古文大家的身份动手翻译小说,并把西方的小说家同中国的太史公相提并论。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着重肯定了林纾在古文运用方面做出的前所未有的成绩,指出林纾以古文译小说,是对古文运用的一种新的尝试。但他又认为这种成绩终归是失败的,因为古文是“已死的文字”。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